

目 录

活跃在三水抗日前线的-支	
四会青年服务队.....潘达口述 黎国荣 龙炳整理	(1)
马来西亚的四会华侨.....谭正光	(6)
爱国华侨萧焕.....谭正光	(15)
✓四会的人口变化.....剑	(18)
四会集市贸易探源.....碧 天	(20)
田赋话旧.....绛 云	(23)
商业话今昔.....马 华	(28)
纪仓周柴杉竹业的兴衰.....马·汤	(33)
四会新旧金融机体变革.....甘乃谋	(40)
昔日的米业与加工.....集 群	(47)
会城布疋百货业的变迁.....集 群	(53)
四会印刷业简史.....集 群	(59)
我县文具图书业纪要.....众 人	(64)
说酱园.....林剑文 张定干 蒋达鹏	(68)
中药与掌柜先生.....众 人	(72)
从剃头档到美容院.....碧 天	(77)
话说猪栏.....吴芳口述 谢剑影 纪录	(80)
古今商业谚语选.....鲁 逢	(81)

活跃在三水抗日前线的一支

四会青年服务队

潘达口述 黎国荣 龙炳整理

“七·七”芦沟桥事变，祖国大地燃遍了抗日救亡的烽火，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奋起，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一九三九年，侵占广东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妄图从广州向广西推进，其部队已推进到三水县的官窑、沙头、三江一带，准备强渡北江河向四会的马房、大沙挺进。然而，当时驻扎在此担负抗日使命的广东省税警总团（后改称为暂编第八师）和由我党掌握的四会县国民兵团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坚决阻击日寇前进。于是，北江东西两岸形成了两军对峙的紧张态势。那时，三水的洛平、小迳、陆洞、桃墟、大勒、芦苞和四会的大旺、马房、大沙等一带就成为蒋管区通往沦陷区的要道。这样的地方，日寇叫“无人地带”，国民党称之为“缓冲区”，我们叫“敌前”。当时，这些地区有日本侵略军，有国民党的部队，有土匪、汉奸特务等等，成份非常复杂。他们在那里横行霸道，敲榨勒索，奸淫掠擄，无所不

为。那里的民众和由此过往的商人、小贩，一方面备受他们压迫，加收捐税，组织什么维持会，进行所谓防共防奸，一方面经常受他们奸淫、烧杀。广大群众真是叫苦连天，惨不堪言啊！

同年五月，我党为了打开三水抗日前线的新局面，唤起敌前民众抗日，狠狠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把抗日救亡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西江特委指示四会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下简称四会临工委），组织一支三水前线服务队，开赴这一地区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抗日。四会临工委书记谭丕桓接指示后，召开临工委会议，决定在上林、大沙、下茅、龙头、邓村等区乡的青年训练学习班中（当时全县各区乡都办有青年训练学习班）挑选斗争性强、愿为抗日出力的青壮年共一百二十多人，组成四会青年三水抗日前线宣传服务队，下分六个小队进行活动，指定由当时来四会搞抗日工作的中山大学服务队成员、共产党员肖德根和当时来这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成员、共产党员潘达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副总队长。服务队的主要任务：一是巡迴三水抗日前线各乡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联防抗日；二是深入敌人内地搜集情报。因为服务队是各区乡青年训练班中的骨干，思想进步，要求抗日，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积极培养和锻炼考验他们，准备吸收他们入党，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就这样，四会临工委组成的四会青年三水抗日前线服务队，奔赴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服务队前往三水时，县临工委负责同志张源（即陈德）对肖德根、潘达指示：前些时候，我党已派陈少陵等一批同志随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长田竺僧去了三水，并在其

县府建立了特别支部，你们到三水后‘要密切与陈少陵、赵元浩同志取得联系，你们与他们发生党的组织关系，成立前线临时党组，共同领导前线服务队，开拓敌前工作，发展抗日新区。

同月下旬，服务队全体同志满怀革命豪情，从四会镇出发，经四会上林、三水芦苞，直插元潭驻下。之后，与在此任区长的我党同志赵元浩和三水县府地下党别支书记、政工队视察员陈少陵取得联系，成立前线临时党组，领导服务队开展抗日工作。接着，临时党组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敌前情况，认为三江、官窑、沙头是日军凭河据点，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敌力量较强，工作不利，要先从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展开工作。临时党组决定在洛平、小迳、陆洞、大勒、桃墟一带，利用税警总团政工队的合法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在搞好群众关系的基础上，然后逐步全面铺开。在宣传中，队员们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他们分成小组，日夜走村过寨，组织民众办夜校、召开群众会，运用演讲、演戏、唱歌和出壁报、贴标语、谈心等多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宣传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形势，宣传我“抗日必胜，敌人必败”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后，民众抗日的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御敌情绪日益高涨。他们纷纷要求起来联防，与抗日救国的军队、团体一起，打击日寇、汉奸的烧杀掳掠，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敌前工作，经常与敌特打交道，工作既紧张又艰苦，搞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六月的一天早晨，当时服务队驻宿在汉塘村，被汉奸知道了。在汉塘村附近即向其主子发出讯号，日敌机关马上指派飞机，对汉塘村狂轰滥炸。赵元浩、

肖德根和潘达带领各分队队员奋不顾身，一方面组织队员、群众撤离及掩蔽，一方面带领手枪组的同志追捕汉奸。在群众的揭发和支持下，经过大家紧张而严密的搜捕，终于把发射讯号向日敌“通水”的汉奸抓获，押回元潭墟。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把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严惩了。这次日敌飞机突然而来的扫射轰炸，服务队的一位姓温的队员（龙头人）不幸中弹牺牲了。事后，服务队的同志怀着无比的悲愤心情将其遗体运回龙头，召开追悼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经过半个月的摸敌情、宣传发动以后，临时党组召开会议，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大家觉得前段巡迴宣传的时间、方式不能适应敌前的环境形势，决定把服务队撤回群众基础较好的元潭墟驻扎。为了避免日寇飞机的轰炸，服务队的工作改在晚上分散活动。每天傍晚出发，把队伍分成几个小队，分别到几个小村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联防抗日，宣传、组织完毕后，立即按约定时间、地点集中回来。为使工作顺利进行，由陈少陵、赵元浩、潘达等同志带领武装班先进村摸清情况后，然后让队员们入村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这样，既不耽误群众的工作，又能较好保障服务队员的安全，受到群众和队员的欢迎。

过了几天，敌人发觉服务队改变了宣传工作的方式，就暗地里加派汉奸特务侦探，多方捣乱破坏服务队活动。这些傢伙在群众中造谣惑众，威胁群众不准参加服务队召开的会议，不准参与联防，不准支持帮助服务队工作，有时还在会场公开捣乱。曾有几回，服务队与日伪的汉奸走狗发生冲突，大家面对面、枪对枪进行斗争。

又有一次，服务队到远离元潭的乡村宣传，在服务队宣传完毕拉队返回驻地时，由于那天晚上很黑，伸手不见五指，在归途中迷失了方向，闯到了日军的据点去。服务队武装班的同志已接近敌人的哨兵，隐约看见敌炮楼火光，此时服务队才发觉走错路。于是服务队立即后撤，脱离敌人阵地，近天亮才返到元潭驻地。这次宣传走错路，幸好先发现敌人，如果被敌先知道，那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了。

通过这次敌前宣传抗日救亡工作的锻炼和考验，服务队成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吴春良等十多位优秀青年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七月初旬，上级党委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决定把服务队撤回来，其工作由广东省税警总团政工队接替。四会青年三水抗日前线服务队虽然服务时间不长，但是对当时三水抗日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为该县抗日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来西亚的四会华侨

• 谭 正 光 •

四会华侨旅居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侨居地以马来西亚，新架坡为主，其次是越南、再次之是印度、印尼、菲律宾、越、柬、缅、泰、等国也有部份。六十年代开始，又有不少四会人从越、柬、香港，马来西亚等地再移居美、加、法、荷、英、澳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人们说世界上有火烟的地方就有华人，现在可以说：世界五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也基本上有四会人了。

海外究竟有多少四会华侨？迄今也没法准确的统计，而我认为其数量有将近十万人之众，因为光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会人起码有七万人以上。

四会人出国起源于什么时候，因年代久远，现在也难于考证查清，但大批移民移居海外的是清末民初。民初至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由于家乡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不断，这正是四会人大批地离乡别井，飘洋过海的高峰时期。在这段时期，许多乡村有成半数的人口都出国去了。有些村庄在国外的人口甚至超过了留在乡下的人数。

解放前乡亲们出国叫作去南洋或过州府，其实，所谓南

洋州府就是指马来亚和新架坡。去越，柬的就叫作去安南。当时过南洋州府是很随便的，是不受什么限制的，用不着办什么出入境护照，随时可以往返。在那个时候，有些专门带人往返于南洋的水客。早期较出名的水客有谭超（又名盲公超）、孔泉（又名孤寒泉）后期有谭燕山和陈兰等人。

马来西亚和新架坡以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两地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五十年代初期，在英国结束殖民统治时才分而治之；分别让其独立，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马来亚改称马来西亚。

既然四会人大多数是旅居于马、新两地，其中，尤以马来西亚为主，我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归侨，除了对马来西亚四会华侨的概况有些了解之外，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是无知和陌生的；因此，在这里我只能着重介绍一点有关马来西亚四会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马来西亚于一九五二年独立。包括“巴沙”在内，现有入口一千三百余万人，主要居民以巫、华、印为主体，巫族即马来西亚土著民族，俗称马来人，华族即中国人，印族泛指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全马华人近六百万，占总人口40%左右。四会人估计有六万多。

马来西亚原来划分九个州，计有雪兰莪，吡叻，太平、吡叻（又称檳城、丹洋或新埠）彭亨、森美兰等州。主要城市有吉隆坡，怡保，檳城。吉隆坡系雪兰莪州的首府，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

四会人遍住马来亚九州，但大部份聚居于吉隆坡、怡保、太平，吡叻以及文冬、彭亨，芙蓉等州市。

凡是四会人聚居之处基本上叫做四会街，大部的州都有

四会街。吉隆坡原来有三处为官方承认的四会街，一是文良港、二是孟沙律（又叫板底），三是暗崩。吡叻州也有两处较出名的四会街，一是万里望、二是金宝。太平的四会街规模也不小。

所谓四会街并不是在市区内的街道，实则系市城外的乡村，但这些乡村并不是农村，乡亲们也不是从事农业，而只是乡亲们在锡矿区或橡胶园附近自建的房屋住区。

在各州市的四会街，文良港、板底、万里望三处规模最大，户数和人口也最多。如吉隆坡文良港四会街，三十多年前，已有乡亲上千户，人口五、六千人。街里建有上、下两间佛爷庙，供奉“阮、梁圣佛”牌位。万里望及一些其它主要的四会街，和文良港一样，同样建有“佛爷庙”。

四会街的“佛爷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庙宇。其实只不过是乡亲们的慈善福利机构和有事聚集的场所。有点像我们解放前农村的祠堂。各“佛爷庙”都置有大量的椅凳桌椅、碗碟厨具及帐篷等，供乡亲们婚娶请酒或丧事借用。大部份的“佛爷庙”办有乡亲们的“善后互助部”。（俗称老人会）办有小学，供同乡儿童读书。文良港四会街的育才小学，就是在佛爷庙中扩建而成的。“佛爷庙”在四会街内成为群众性组织的聚集点。

吉隆坡由于城建范围日益扩大，所以，原有文良港和板底的两处四会街，均先后被征用，乡亲们除少部份迁到热水湖和淡江两地，绝大部份均迁往吉隆坡市十余公里外的远郊，现名吉隆坡大港千百家新村，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四会街。

“佛爷庙”也随着乡亲们在千百家新村重新安家落户。

马来西亚各主要州市都有会宇同乡会。历史较久，活力

较强，规模较大的同乡会首推吉隆坡、怡保、吡叻三市。吉隆坡的会宁同乡会诞生已七十余年，始创于文良港四会街，后迁往市中心的华民后街。吉隆坡现任会长乃罗东贵先生，怡保同乡会现任会长为陆汉强先生（清塘区白沙乡人士）吡叻会宁同乡会现任会长乃高松华先生，（会城仓岗高屋人士）。

历史上由于四会、广宁原出一家，有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尽管在马来西亚四会人多于广宁人，但各地同乡会均冠以会宁之称。

马来西亚的四会乡亲绝大部份都是劳工，男子大多数系建筑工人，俗称“三行”，即泥水、木工、油漆粉刷。妇女大部分原来均在锡矿或橡胶园做工，也有小数养猪种菜园。还有部份独身无子女拖累的妇女，则受雇于富户当佣工，俗称“使婆”。在怡保埠和吡叻埠的富户佣工，绝大多数都系四会人。国内四会镇有许多间“姐妹屋”就是上述那些佣工在国外集资派人回来购置的。她们是准备年老力衰时回国安居以度晚年的。

乡亲在马从事工商业者不多，且多系小商贩户、中产户屈指可数，大户未闻有之。目前较知名的中产户系吉隆坡的彭威五先生的电器业（清塘区白沙乡人士），林绍伟先生的杂货业（清塘区高狮乡林寨村人，系县侨联已故主任林绍华同志的胞弟）。怡保埠是已故的黄成学先生（大沙区黄岗乡人，系黄志良同志的祖父，也就是笔者的姑丈），所开创的卫生堂系统的药材业；以及陆汉强先生的机械制造业，李林先生（下茅区马陂乡人士）的服装业和玻璃业。在吡叻则首推高松华先生的钟表业。原来怡保四会人首富李竹溪，（下茅人

士）因后继无人早已湮没，吉隆坡邓宽（清塘区高狮乡邓寨村人士）的锡矿业也已衰落而不复存在。

三十年前乡亲们不论在马居住了多长时间，但仍然保留着故乡的传统和风俗习惯，择偶时非同乡不婚、三十年代的姑娘出嫁时和家乡一样，唱大哭歌、戴凤冠、穿霞帔，拜堂坐花轿。总之、婚、丧事及年节规例一如家乡。但现在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出生于当地的人，受的是巫，英文教育，加以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日趋巫化和西化，这些人在婚配上已打破了以往非乡亲不婚的传统习惯，许多人已经和外县、外省，甚至不同肤色的别国人结了婚。

如果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夕是四会人较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话，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大致是属于第一代，而五十岁以上至七十岁以内的基本上属于第二代。五十岁以下的都可以算作第三、第四和第五代了。第一、二代人基本上是出生于故乡，而第三至第五代人则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第二代人和先辈一样、是拓荒者和创业者、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挣扎和拼搏。这一代人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童年时代大部份只受过三、四年私塾或小学教育。十二、三岁就要进工厂或商店学师做工。我进厂做工时，年还未满十二周岁。在吉隆坡文良港四会街，和我同令的人，也就是五十五岁至六十岁的人约有五、六百人，高小毕业的还不到十人，初中毕业的只三人，至于女子，基本上都没有上学读书，绝大部份都是文盲。当时文良港四会街乡亲们由肖焕先生牵头办有初级小学一间（育才学校）还有私塾四所。我记得一个女学生都没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代人在文化上已有了极大变化，不论男女，都普遍入学读书，三十岁左右的人，一般都读完九年制中学，许多人还到新加坡，台湾、英、美及澳大利亚上大学和留学。稍为富裕一些的家庭，都普遍让子女出国读书留学。如黄志良同志的两个堂弟都是澳大利亚留学毕业的。普遍人家的子女出国读书的也大有人在，如我有个堂兄只是个木工、其妻也是做泥水小工的，靠夫妇做工来养活五、六个孩子，其生活确实是比较困难，居然有一个儿子在台港东海大学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由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第三代人所从事的职业，已不像先辈那样只局限于泥水、做木和油漆的“三行”，而是走向社会的中、上层，许多人已成为工程师、教师、律师以及政府机构或工商企业的高级职员。

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实行以巫、英文为官方文字，巫、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课程以巫、英文为主，华文课每周被压缩到只有几节。最近，当局还准备强行以巫语为教学媒介。也就是说，用马来语读华文书。因此，第二代以后的人，尽管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但读完九年制中学甚至大学毕业，却没法用中文给故乡的亲人写一封信。我们这些海外的炎黄子孙，恐怕为时不远将会被“巫化”而数典忘祖了。作为仍有亲属侨居当地的归侨、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世代代要在这块土地上永久繁衍生活下去，就必然地要和当地的人民相溶化而成为一体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但其民族的传统和特点绝不会因此而消失的。

漫长的海外孤儿生活，使我们旅外的乡亲和其它各地侨

胞一样，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之心，同时，在侨居地，又养成浓厚的乡土观念，凡我乡里，都是尽一切可能集中一处居住以便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以免受外人的欺侮。各地的四会街就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否则，零星杂居于当地民族的地方，一遇排华，就必遭难。马来亚曾发生多次排华事件，但各地四会街的乡亲均未受到损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乡亲们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使排华者慑于四会街的力量而不敢进入四会街。因此，各处四会街的乡亲、都是同舟共济，互相提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一家有难，百家相帮。街内充满了团结、融合、和谐的气氛，只要是四会人，不管你的家乡是清塘、下茅，江谷、邓村还是石狗或南街、都是像兄弟妹和亲戚一样。大家确实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乡亲们在生时不但要和自己人住在一块，而死后也要埋在一起。许多地方都有集中的“义山”（俗称大伯公山），去世的乡亲都是埋葬到这种公墓去，每年清明节，除死者的子孙后代前往扫墓之外。同乡会和佛谷庙的理事人，还每年组织乡亲、包括学校学生在内，浩浩荡荡前往公墓义山举行春、秋二祭；集体向逝去的先辈乡亲拜祭，这些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乡亲们团结友爱的观念。

四会是肇庆地区的重点侨乡之一，近十万人侨居海外，这本来是我县四化建设的优势，然而，这几年来，我县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除了香港同胞有较大的贡献之外，海外的侨胞基本上还没有发挥这应有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政策问题还是工作问题？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于我们的乡亲主要居住的地区，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在马来西亚，我们的乡亲在经济上还是两头少中间多，多数

人只是处于温饱的水平，富裕者为数甚少。特别是由于当地政策法规的限制和束缚。我们的乡亲和其它华侨一样，都是当地国籍的公民，当局只准这些公民效忠于当地政府，对于自己祖宗之国难以出力支持，就是对故乡亲人的正常的书信联系，都会受到严厉的限制和监督。亲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绝不能涉及政治，否则将会担受着极大的风险。多年以来，规定给中国亲人的汇款每人每次只限马币四十元。年不满六十岁的人不准申请来华探亲，而探望的范围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除此之外均不符合申请条件。就算符合上述条件，查批也非常不易。但以旅游名义申请来华的较为容易获得批准，

第一代基本上已逝去，尚存的也是八、九十岁风中残烛的高年。重洋远隔、万里云山，只有北望故国而兴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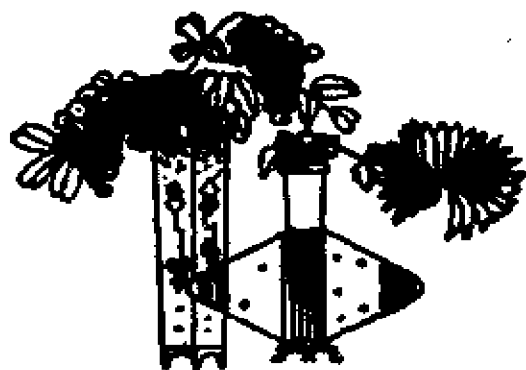
第三代以下的人由于土生土长及巫化教育的结果，对祖辈的家乡已了无印象，对故乡亲人的关系是陌生和疏远的。

六十岁上下的第二代人是承先启后的关键、是维系连接下代人的基础，这代人部份出生于故乡，在祖宗之国有比较多的直系、傍系亲属，还有那童年时代青梅竹马的伙伴。他们对故乡的山山水水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月是故乡圆，家乡的水都是特别甜的。而那出生在国内的同代人，因为受的是纯中文的教育，加以自小在父母的教育影响下，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思乡之心。

第二代人大部份还身强力健，有较强的社会活动力和经济实力，他（她）们渴望早日回来看看自己的故乡，看望自己的亲人。家乡热已经兴起、回乡旅游探亲的高潮已经到来。如果我们要真正发挥侨乡优势，并更好地争取三、四代

的人，就必须致力第二代人的工作。归侨，侨眷和这一代有着血肉相连和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还必须做好归侨侨眷的工作，发挥他（她）们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使我们海外众多的后代亲人，虽世居异国而赤子之心不变。

马来西亚情况特殊，华侨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要体谅我们海外亲人的处境和困难。任何不适当的态度，都会给海外亲人带来麻烦甚至灾难。



爱国归侨萧焕

谭正光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四会县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肖焕同志，是本县清塘区清塘乡肖屋村人。出生于马来西亚，在马期间一直从事建筑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马参加了中国致公党，并积极参加和支持马来西亚的抗日和抗英斗争，为马来西亚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为殖民主义者追缉，于一九五三年由中国致公党安排返回祖国。其家属也受株连而被迫回国。肖焕同志回国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努力做好海外华侨的联络工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肖焕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与当地筹款支援祖国抗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刚刚诞生，由于正统观念的原因，新中国的形象尚未为海外华侨所普遍认识，而肖焕同志自己出钱和其他的爱国侨胞一道，联名在星洲日报上刊登“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贺电，并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唤起侨胞们对新中国的认识。

肖焕同志是一个普通建筑工人，没有什么资产，然而，在侨居外地一贯热心为华侨乡亲的文化教育以及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数十年如一日，深得文良港广大会宁乡亲的爱戴和尊敬。他曾经是吉隆坡会宁公所（即会宁同乡会）创建人之一，也是文良港育才学校的创建者。育才学校创办于一九三九年，是旅马乡亲最早建立的新式学校，和我同年代的人，绝大部份都就读于这所学校。在育才学校未开办之前，文良港的几百个会宁儿童都是在几间私塾就读的。为创办和发展这间学校，肖焕同志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回国之前一直是育才学校的校董事。

肖焕同志回国之后，通过学习和工作，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他长期以来为公忘私、胸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没有因为自己身份特殊（回国前他已被选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自己或者因为为祖国为华侨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而居功自傲，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例如，一九五六年，他由广州返回四会定居，带头筹建四会县侨联会，是侨联会创建人之一，但在侨联正式成立后，他认为自己文化低，而且不善词令，所以，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四会县黄岗华侨中学成立之后，他就专职在校工作，但后来侨中改为公办，他经劳动部门安排到县汽车站当木工，这时他已年过六十。“文革”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致公党华南支部的负责同志前来四会，鉴于肖焕同志年事已高，并根据当时形势，叫肖焕同志离职休息，其生活费改由致公党负责解决。不久，十年动乱开始。民主党派到冲击而陷于停顿。他的生活费用也告断绝，无分文收入长达半年之久。最后才由县安排他到县农机二厂看门口，直